

# “三宝崇拜”与敦煌藏经洞

## ——莫高窟藏经洞的性质再探

李并成, 李玉林

(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由敦煌藏经洞的藏品类别与中原佛寺的“三宝藏”基本一致可推断: 藏经与佛教的“三宝崇拜”思想密切相关, 藏经洞是供奉佛教“内藏”和“外藏”之处所, 藏经的主体是供养经。藏经亦与敦煌、高昌等地自古以来敬惜字纸、收藏字纸的习俗有一定渊源。土地庙等后出敦煌遗书是上述观点的实物例证。

**关键词:** “三宝崇拜”; 敦煌藏经洞; 性质; 原因; 土地庙遗书

**中图分类号:** B949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13 (2008) 01-0047-04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问题, 历来众说纷纭, 人们常以“石室宝藏”、“石室藏经”、“沙漠中的图书馆”、“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等来形容和说明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的性质。但这一问题既牵涉到藏经洞封闭原因的探讨和封闭时间的推定, 也关联到众多敦煌学学者所期待的敦煌文书是否可能有新的出土。对此前贤已有诸多论述。刘进宝、沙武田曾对此问题作了综述, 沙武田将藏经洞的性质归纳为5种说法: 1. 藏经洞是为避难对佛藏的临时性处理场所; 2. 藏经洞是对佛教废弃物的处理场所; 3. 藏经洞是敦煌其中的一所寺院——三界寺的收藏佛经(包括古旧残破佛经)和供养佛教其他法物之处; 4. 藏经洞与佛教传统的“石室藏经”有关; 5. 藏经洞是佛教徒供养佛教法物的地方, 藏经洞写本佛经是供养经。<sup>[1]</sup>

笔者认为后三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这三种说法基本趋同, 即都认为与佛教的藏经和供养法物有关, 只是各人的知识背景、研究方向不同, 故论述各有侧重。但其所包含的“石室藏经”说、“法物供养”说, 都未联系敦煌文书本身的特点、藏经产生的思想基础和施行动因以及佛教徒的仪规、后出土敦煌文书等因素进行探讨。对此问题笔者想谈谈自己看法。

—

敦煌藏经洞藏经的思想基础是唐五代时期佛教普遍流行的“三宝崇拜”思想, 藏经洞藏品是“三宝崇拜”思想的产物。

(一) 从魏晋到五代, “佛法僧”三宝崇拜的佛教思想在中原和敦煌都很盛行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 为扩大对民众的影响力, 开始强调佛祖、僧人、佛经的作用, 认为佛祖是佛教的创造者, 僧人是佛法的弘扬者, 佛经是佛法的承载者, 并为神圣之物, 从而在信佛大众心目中形成了对“佛”、“僧”、“经”的崇拜, 称之为“三宝崇拜”。出于对佛祖的崇拜, 信众们修寺建庙、开窟造龕、塑像描影, 蔚然成为风潮。许多善男信女为此大肆施舍财物, 有的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 兰若四万, 僧尼二十六万五百”<sup>[2]</sup>。即使地远人稀的下州—沙州竟也开窟千座, 窟内塑像以及窟内所绘佛像、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经变画等总面积达45万平米之巨, 这些充分说明无论在中原还是敦煌, 对“佛法僧”的崇拜自魏晋至唐宋五代延绵不绝, 并未受政权更迭、战乱灾害、民族变迁干扰, 显示了佛教思想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

(二) 作为“三宝”之一的僧人, 从魏晋到五代在敦煌一地都倍受尊崇

史载, 北凉创立者沮渠蒙逊曾从西域延请高僧鸠摩罗什到凉州宣讲佛法、开场译经, 封其为国

师,对其言听计从,甚至让其参与军国大事的决断。统治西北的五凉无一例外都崇佛,在境内大力扶持佛教,广修寺庙,皇帝亲自听法,参拜佛像,组织盛大法会,借以凝聚境内各族人心,加强对臣民的思想控制。从敦煌一地来看,乐僔、法良以一介贫僧而能于荒凉僻野开窟造龛,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到吐蕃统治初期,寺院已有13座,僧尼达310多人;至末期,寺院增至17座,僧尼猛增至数千人。可以看出,当时僧人地位尊贵,待遇丰厚,许多文官武将都“舍官出家”。高僧大德摩诃衍曾被吐蕃赞普亲自召见,在拉萨参与了汉僧与印度僧人关于禅的辩论。<sup>①</sup>吐蕃和归义军时期许多高僧还担任高级僧官,如教授、都教授、僧统、都僧统,僧官和僧人普遍参与民众生活,举行法会,为人诵经、发愿、攘灾等,俨然是思想界的权威和统治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吐蕃统治时期建立了寺户制度,这保证了僧人的生活供给;到归义军时,僧人同样受到官府和民间百姓的优待。这种持续尊崇、优待僧人的现象,是中原内地所不曾有的。既使历史上有名的“三武灭佛”活动都未波及敦煌。从五凉到吐蕃、归义军再到西夏,每一个统治敦煌的政权都不遗余力地扶持佛教的发展,因此尊崇和优待“三宝”之一的僧人,也是敦煌地区的一贯传统。

(三)“三宝”之一的佛经,在魏晋至宋、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僧俗两界一直十分重视

南北朝时各国统治者都争相延请高僧大德,登坛说法,开场译经。译经的要求和程序十分严格,如必须经“三校”并署上校对者的名字后才算完成,以保准确无误。宋代雕版印刷技术成熟之后,历代王朝统治者或信佛的僧俗大众都以能刻印一部《大正藏》为无量功德,为此不惜耗费巨资,这也被视为国家兴盛或家业兴旺的标志。中原地区对佛经的尊崇尚且如此,尊崇佛教从未中断的敦煌地区更不待言。小小20多平方米的17号窟所出土的5万多件敦煌文书,大多数属于佛教文书,最早的成书于前秦时期,最晚的成于公元1002年曹氏归义军晚期。敦煌写经中带有寺院标记(包括藏书印、寺名缩写等)的写本,无疑以三界寺的最多。斯坦因推测藏经洞文献的主要来源就是三界寺藏收室的藏书。<sup>[3]</sup>迟至公元1002年,沙州官府和当地民众仍在抄写卷轴式佛经,既使到莫高窟衰败的清末时期,仍有人雇人写经,供奉于莫高窟前的破庙前。这说明在敦煌对“三宝”之一——佛经的“崇拜”也是自佛教传入后就延绵不绝,直至近现代仍有传

承。

正是由于“三宝崇拜”尤其是佛经崇拜思想深深扎根于敦煌,才使得藏经出土前的600多年来,敦煌僧俗将佛经,无论新经还是旧经,无论卷轴装、蝴蝶装还是梵叶装,无论大藏经还是疑伪经,都视为神圣之物,崇敬地供奉起来,才为后世遗存下来数量庞大的晋唐时期宗教和世俗文献。倘若没有“三宝崇拜”思想以及敦煌地区保持这种思想的连续性,可能敦煌文书也会像中原地区当时的写本一样,在频繁的政权更迭、宗教变动之中,遭到损毁丢弃。沙武田提出,藏经洞藏经是出于末世灭法思想的氛围之下的一种护法行为。<sup>[4]</sup>与“末世灭法”说法相比,用“三宝崇拜”思想来解释数量如此众多、跨越时代如此之久远的藏经洞藏经恐怕更为适宜。

## 二

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品类别看,与中原内地佛寺的“三宝藏”基本一致,故藏经洞的性质乃是供奉佛教“内藏”和“外藏”之处所,并非佛经避难之所或处置废弃佛经之所。

何谓“三宝”?佛教典籍及今人辞典对此解释和说法颇多。丁福宝在《佛学大辞典》中将其解释为:“木佛画像,佛宝也;三藏之文句,法宝也;剃发染衣者,僧宝也。”一切三宝功德,构成“三宝藏”。张弓认为中古时代万千僧伽蓝,无数佛像、佛画、藏经以及种种供养具等,都属“三宝藏”。中古时期,中国的许多寺院既入藏经律论等“内典”,也入藏“外典”即传统典籍。大正藏载释伽牟尼允许寺院有“外学”之书:“祇洹寺中有四韦陀院,外道?为宗极。又有书院,大千世界内所有不同文书,并集其中。佛俱许读之,为伏外道貌岸然,而不许依其见也。”<sup>[5]卷54页240</sup>这些寺院还特别关注守护本寺的先代人文名物,不少热衷于倡扬附丽于本寺的种种人文故实,成为形态上的“文化藏”。<sup>[6]</sup>

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各类藏品与中原佛寺的这些“三宝藏”如出一辙。

首先,二者都以“经律论”等“内藏”为主。只是敦煌藏经洞的藏经构不成一部完整的大藏经,而是供养经居多。这可能是由于所出的内藏仅是敦煌十七个古寺中较小的三界寺所藏的缘故。

其次,两者都藏有丰富的中华传统典籍。六朝时期,僧俗之间交游往还,诗文酬唱,高堂论对,

成为江左盛行的文化风习。不少高僧“出入孔释”、“兼学六经”，儒释融通，寺院置备“典籍藏”，正是中夏释门所需。大约晋宋之际江左某些大寺首先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典籍藏”，如宋初刘司空造丹阳牛头山佛窟寺，并出资为寺“访写”书藏：“有七藏经画：一佛经，二道书，三佛经史，四俗经史，五医方图符……永镇山寺，相传守护。”

<sup>[5]</sup>卷50页858 唐初佛寺置外学典籍已相当普遍。敦煌所出的文书除佛典外，很大部分就属于“外典藏”，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已基本齐全。在唐代佛寺群系中，敦煌寺院只算是小寺，相比之下它所收藏的典籍可谓庞大，其外典的收藏体系亦完全与中原佛寺一致。

再次，两者都存有大量的名物藏和故实藏。华夏民族历来珍视自己的故里名物，形成浓厚的故物文化意识，历代敦煌人也同样拥有这种地缘人文自豪感。东汉洛阳白马寺有“白马负经”的动人传说，其经函等就成为白马寺的“名物藏”。敦煌则有“沙门乐尊仗锡西游，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龕像”<sup>[7]</sup>的记载。中古佛寺以独家名物著称的记载很多，如衡山般若寺藏唐太宗手书梵经20卷，蓝田法华寺藏张说《二法堂赞》等。敦煌遗珍中也有许多佛寺“名藏”的遗存，如唐人临王羲之的《瞻近贴》与《龙保贴》、贞观临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永徽拓本唐太宗《温泉铭》等。中古中原佛寺的“故实藏”，大都附丽本寺及寺物上的史事传说、人文掌故，口碑相传，见于方志寺志，虽有附会，但大多是有根据或真实的。<sup>[6]</sup>中古佛寺常将文化名人、政治名人、京寺“常住掌故”与本寺联系起来，如唐梓州射洪县东武山真谤寺被认为是唐初文学家、里人陈子昂的故宅，苏州嘉兴县北的太平禅院因唐德宗朝名臣、里人陆贽早年在此读书而闻名。随意翻开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志》、《敦煌录》等，可以看到其中记载了许多人文史事、地方掌故，如关于先王庙、效谷县、张芝墨池龙堆泉的来历，尤其是《敦煌古迹二十咏》对莫高窟、贰师泉、渥洼池、墨池等的咏赞最能反映中古敦煌的名物故实。《敦煌名族志》、《敦煌汜氏人物传》、《张氏修功德记》等则集中反映了敦煌的人物掌故。这些有关地理和人文的文书收藏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废弃之物，而是中古时期敦煌人出于精神需求精心选择的结果。最后，两者都有珍贵的“舍利藏”。佛教认为释迦牟尼的骨身是象征“遗教不灭”的法身，赋以神验性。佛舍利

遂成为释门圣物，拥有佛舍利宝藏的佛寺名气也大。唐朝曾六次迎佛，西安法门寺的佛骨舍利藏，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佛门圣藏。在中晚唐的京畿地区，“舍利崇拜”非常盛行。远在西陲的敦煌佛寺，也曾盛行“舍利崇拜”。S. 1438 背书仪提到：“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粒并金棺银椁盛全。……沙州置经千祀，舍利出后百年，寺因莲花而建名，塔从舍利而为号。金棺银椁，葬于九地之中；月殿星宫，镇于一州之内”。<sup>[8]</sup>

由此可见，敦煌藏经洞中的藏品从种类上说，无外乎还是中原佛寺的经律论“内藏”，还有典籍藏、名物藏、故实藏和舍利藏等，二者的藏经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敦煌保存下来的这些藏经藏在洞窟的石壁之中，而不像大多数佛寺仅藏于殿堂楼阁之中。此外，中原佛寺所藏由于战火兵灾延绵、气候卑湿等原因而不存；敦煌藏经则孤悬塞外，因灾祸少加之气候干燥少雨，十分有利于纸质文书的保存，因而得以存传。

### 三

藏经洞文书的存留也与当地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密切关联。

敦煌文书中最有研究价值的社会经济类文书的留存，不仅得益于佛经的供养，还有赖于敦煌本地居民敬惜字纸和保留官私文书的习俗和传统。当然这一传统与早期纸张供应不足和价格昂贵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源于中原内地的视字纸为圣物的传统。有学者认为人们祭兮、建惜字林、设拾字僧、开凿敦煌石窟，表明了古人对人文信息的崇拜，信息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敦煌遗书的保存正得益于此。<sup>[9]</sup>历史上，国人即使对已废弃不用的废纸也不随意损毁，而只能埋入地下或收藏起来，至今许多地方的民间仍有这样的习俗。正因为当时这一习俗的盛行，大量官府和民间废弃的种类繁多的手写文书得以存留在民间，它们才有机会以裱糊、修补佛经或以背面抄写佛经、寺院帐目等形式历经数百年而保存下来。除敦煌外，距它近千公里的高昌（今吐鲁番地区）也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纸质手写文书。除气候干燥、偏远荒凉、少人侵扰等因素外，也是因为晋唐以来西北边陲有敬惜字纸的习俗和传统，这对敦煌、吐鲁番成为中外最负盛名的中古时期纸质文书出土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究竟两地居民出于何种原因敬惜字纸、文书，尚

不能完全识其奥秘,但吐鲁番出土文书常被当时居民制成纸鞋、纸帽、纸腰带、纸棺甚至直接用作陪葬物,由此可以推测敬惜字纸的传统可能与神灵敬奉或鬼怪信仰有关。

#### 四

敦煌新出土的土地庙文书以实物证明藏经洞文书系佛教正常的藏经(“内藏”和“外藏”),所藏佛经主要是供养经。

1944年8月,即藏经洞文书出土后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六朝残经85件及残片32件。李正宇从调查土地庙及内藏经卷五尊塑像的建造年代入手,比较分析了土地庙遗书与藏经洞遗书的差别,进而认为土地庙遗书既“不是王道士藏纳的”,“又不是藏经洞藏品的散出物”,而是具有“不同于藏经洞遗书的独立体系、源流和归属”。<sup>[10]</sup><sup>130</sup>池田温也认为:“土地庙遗书之来源,一定不由藏经洞遗书。”<sup>②</sup>李正宇后来进一步提出,其论据一为莫高窟上寺主持老喇嘛易昌恕所回忆“土地庙与上寺同时建于清道光十年(1831年)”,早于藏经洞发现之前69年;论据二为土地庙藏经是“缠在塑像体内的中心柱上的”,绝非后来塞入塑像体内的。<sup>[10]</sup><sup>133</sup>其实敦煌境内曾多次出土过古代写经,如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河东岸元代喇嘛塔中出土了《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及西夏文《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再如,王三庆提及日本天理图书馆藏《般若波罗密多经》有道光七年(1827年)李宗翰题记,云:“闻此卷乃某君遣戍伊江时,得于敦煌塔中。”<sup>[10]</sup><sup>135</sup>

上举诸批经卷或出于藏经洞之后,或出于之前,表明敦煌当年的藏经活动并不少见。由此说明中古以来敦煌地区各佛寺一直保持着供奉供养经、收藏字纸与官府文书的传统,经书有的藏于佛像中,有的藏于佛塔中,有的塞于石窟壁画底层的石洞中,像敦煌遗书这样数量巨大的藏经则藏于第16号石窟的狭小石室之中。据此可以推断:敦煌藏经洞不只一处,当年的藏经不只三界寺一寺,今后还可能会有新的敦煌藏经,在今第17号窟藏经洞外被人们以另一种方式发现。

总之,关于藏经洞及其藏经的性质问题,“废

弃说”、“避难说”均难自圆其说。笔者认为藏经洞乃在“三宝崇拜”基础上供奉佛经、外典之处所,藏经主体乃是佛教的供养经,也有如典籍、官私文书、幡画等外藏,藏经与敦煌自古以来的敬惜字纸、收藏字纸的习俗有一定渊源。虽然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譬如,藏经阁藏经仅是三界寺的供养经吗?藏经中相当数量是吐蕃时期的佛教和社会经济文书,这是人们因憎恶吐蕃统治而废弃封存的吗?随着敦煌研究的深入,相信藏经洞的藏经之谜必将会被逐步解开。

#### 注释:

- ①参见汉文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第二道表疏的续文与结尾部分。
- ②参见池田温《19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载于1987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集》。

#### 参考文献:

- [1] 沙武田. 藏经洞的性质、封闭原因和时间研究综述 [EB/OL]. [2005-08-15]. <http://www.dha.ac.cn/zhishichuang/cangjingdongdexingzhi.htm>.
-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248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177.
- [3] 荣新江. 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 [C] //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2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4] 沙武田.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J]. 中国史研究, 2006, (3).
- [5] (日)高楠顺次郎. 大正新修大藏经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 [6] 张弓. 汉唐佛寺文化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2.
- [7] 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12.
- [8] 赵和平. 敦煌写本书仪研究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4: 4.
- [9] 桑良至. 中国古代的信息崇拜——惜字林、拾字僧与敦煌石窟 [J]. 北京: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3): 83-86.
- [10] 李正宇. 评莫高窟土地庙藏经来源问题的探讨 [C] // 季羨林, 饶宗颐. 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7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教着手, 当可概览该民族文化之气象, 把握该民族之精神价值与终极理想。对孝的研究, 也必先从其初始的宗教、哲学意义与后起的人文伦理意义整体上加以理解, 才能全面阐释孝之文化综合意义, 才能对孝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做出合理解释。

当然, 在后世的发展中, 孝的伦理化和制度化派生出种种严格的礼仪规范和世俗信念, 长辈对子辈的绝对伦理要求成为封建家长制特有的道德支柱, 这对中国人的性格形成(软弱怯儒、优柔寡断、依赖顺从等)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但在赞同这些对孝道负作用的批评见解时, 不应忘记作为汉民族原始生命哲学的孝所曾具有的对抗死亡意识、消除死亡恐惧不可替代的作用, 及其以族类之不朽为鹄的的内在精神实质。

参考文献:

[1] 查昌国. 西周“孝”义初探 [J]. 中国史研究, 1993, (2): 7—12.  
 [2] 查昌国. 论春秋之“孝”非尊亲 [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1993, (4): 23—27.  
 [3] 周予同.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71—77.  
 [4] 宋金兰. “孝”的文化内涵及其嬗变 [J]. 青海社会科学, 1994, (3): 18—22.  
 [5] 肖群忠. 孝与中国文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23.  
 [6] 杜正胜. 编户与奇民——传统的家族与家庭 [C] // 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216.  
 [7] 叶舒宪. 英雄与太阳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195.

# The Hope for Rebirth behind the Chinese Filiality Culture

*LI Wen-qian*

(School of Arts, Suzhou Univ., 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Filial awareness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thical morality; all moral ideas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started with filial consciousness. In Confucianism, filiality occupie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lace and its ethic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have always been highly regarded. Only when we examine the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and humanist significance of filiality can we rationally understand it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Key words:** filiality; initial connotation; rebirth; clan immortality

[责任编辑 文俊]

[上接第 50 页]

# The Worship of the Three Treasures of Buddhism and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 —— A Re-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Mogao Library Cave

*LI Bing-cheng & LI Yu-lin*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coincidence of the categories of the contents in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roughly with those of the temple librari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indicates that the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cript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orship of the three treasures of Buddhism. The cave library is a storage place for Inner Sutras and Outer Sutras and the bulk of the sutras is those on arms-giving and provision. The storage of sutras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collection and treasuring of printed paper in areas like Dunhuang and Gaochang since ancient times. Dunhuang books later recovered from places like temples of local gods are material proof of the aforesaid view.

**Key words:** worship of the Three Treasures of Buddhism; Dunhuang Library Cave; nature, reasons; books left at temples honoring local gods

[责任编辑 文俊]